

# 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喻采平<sup>1</sup>,何阳<sup>2</sup>,黄岩渠<sup>3</sup>

(1.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2.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会计学院,重庆 401520;3.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文章以2015—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模型,研究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和增收减支功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抑制作用;政府审计通过抑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在政府审计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地区法制水平越高,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强。

**关键词:**政府审计;系统性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F239.44;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6-0066-11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6.008

##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Auditing on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YuCaiping<sup>1</sup>,HeYang<sup>2</sup>,HuangYanqu<sup>3</sup>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ing, Pass College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520,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4, China)

**Abstract:** Taking 30 province-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5 to 2020 as sampl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auditing on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Government auditing reduces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and its functions of handling and punishing in auditing as well as increasing revenues and reducing expenditures have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Government audit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by restraining the debt risks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uditing affecting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The higher the regional legislation is, the stronger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auditing on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will be.

**Keywords:** government auditing;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debt risks of local governments

收稿日期:2024-09-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JY155);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1JJ31165);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YBA010);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YBA018)

作者简介:喻采平(1973—),女,副教授,主要从事风险管理及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

何阳(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风险审计;

黄岩渠(1974—),男,副教授,主要从事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 一、引言

2024年1月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开展审计”。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领域是重点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重要风险,是审计工作需要关注的重点。系统性金融风险既可能由金融系统内部因素(如金融机构倒闭)引发,也可能由金融系统外部因素(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房地产行业风险等)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会对实体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破坏性打击<sup>[1-2]</sup>。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具有独立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优势<sup>[3]</sup>。政府审计不仅能防范金融系统内部因素引发的风险,还能防范金融系统外部因素引发的风险对金融系统造成的冲击。

许奕等认为,政府审计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明了方向<sup>[4]</sup>。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政府审计、金融监管等部门不仅需要关注金融系统领域的风险,还需要重视由其他部门蔓延到金融系统的风险。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孕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扳机点<sup>[5-6]</sup>。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源自政府不合理的财政关系、不透明的转移支付标准,以及预算软约束等问题<sup>[7]</sup>。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能够通过政府债券持有、政府债券担保能力、抵押品价值等多个渠道扩散至金融领域,并对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信贷投放和违约风险带来负面影响,加速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从而演变为威胁金融系统稳定的“灰犀牛”<sup>[8-9]</sup>。因此,为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审计要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债务状况,通过加强审计力度和提升审计效率来推进经济结构持续调整和优化,促进全社会融资规模科学化及合理化,防止地方政府大规模负债扩张<sup>[10]</sup>,从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董维明等认为,政府审计可以协助地方政府建立健全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体系,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行为,从防范财政风险的角度达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的<sup>[11]</sup>。

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提出在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政府审计不只是对金融系统的审计,还需要加强对政府财政、房地产行业等相关部门的审计。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政府审计部门相对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具备全局性优势。第二,本文通过探索性的实证分析,创新理论模型,获得了政府审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验证据。第三,本文创新性地引入政府审计增收减支功能,找到了政府审计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价值的经验证据,支持了政府审计能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结论。第四,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政府审计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路径,即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抑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来有效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根据1994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政府审计工作的重点是预决算、财务、项目、内部控制等方面。200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明确,政府审计要深入分析责任和风险因素,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监督和保障。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尽管政府审计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关于其审计效果的实证研究依然较为匮乏。叶陈云等认为,政府审计功能的有效发挥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sup>[12]</sup>,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于一般的微观个体性金融风险,涉及债务累积、资产关联、杠杆交易、经济政策等不同领域,是一种全面的宏观性的风险,需要更大范围的监督和管控<sup>[13]</sup>。政府审计具备独立性、客观性、宏观性和权威性等特点,能够从宏观层面以及关联性的角度提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建设性意见<sup>[14]</sup>。政府审计能够全面把握

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如市场风险、外汇风险、战略投资风险等,并结合国内外经济运行状况对其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sup>[15]</sup>。政府审计能够对查出的问题进行及时监督整改,构建长期有效的监督体系,从而完善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实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的<sup>[16]</sup>。为实证研究近年来政府审计是否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作用,本文提出假设H1:

H1:政府审计降低了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政府治理能力关系到市场经济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是有效发挥政府审计职能的基础和保障<sup>[17]</sup>。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越强的地区,市场发展越成熟,法律制度也越健全,能够为政府审计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且政府审计也需要根据地方政府治理的情况来确定审计重点和审计风险<sup>[18-19]</sup>。同时,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充分交流、积极配合能够提高政府审计的执行效率,保证政府审计功能的顺利发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在政府审计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我国地方政府为了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而大量举债的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问题<sup>[16]</sup>。2018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指出,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地方政府债务边界不清、隐性债务偿还意愿降低,可能将隐性债务划到政府债务之外,将财政风险转嫁到金融部门,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另外,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不足,给金融机构带来严重冲击,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从而将政府部门的财政风险传递至金融领域<sup>[20-21]</sup>。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政府审计能够通过评价地方政府债务领域相关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查出相关单位的漏洞、违规金额、制度缺陷等问题,为被审计单位提出处理处罚事项及整改

落实建议,进一步优化投融资结构和相关政策,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最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sup>[22]</sup>。为实证研究近年来政府审计是否发挥了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本文提出假设H3:

H3:政府审计通过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抑制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 三、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11年,我国审计署首次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全面审计。2015年,我国开始推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降低债务成本和风险。考虑到审计效应的滞后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15—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除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外)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2015年的地方政府债券数据源于样本省份财政部决算报告及预算执行报告;2016—2020年的地方政府债券数据源于锐思数据库;审计相关数据源于《中国审计年鉴》;样本省份不良贷款率及存贷比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数据源于样本省份的统计年鉴及CSMAR库。

#### (二)变量选取

##### 1. 系统性金融风险

被解释变量为系统性金融风险(*Risk*)。本文借鉴了学者们从多维度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成果<sup>[23-24]</sup>。在综合考虑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主导型特征以及现阶段经济发展特性背景下,本文从金融、企业、政府、宏观经济等维度,主要选取不良贷款率、存贷比、保险密度、股票市场规模、企业亏损率、资产负债率(反映了房地产风险)、财政缺口率(反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投资比率8个指标进行测度(如表1所示)。

测度指标分为正向指标、负向指标和适度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正向指标的指数值越大,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越高;负向指标的指数值越大,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越低;适度指标

的指数值偏离均值越多,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越高。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指标来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拒绝各变量独立的假设,KMO统计检验量为0.701,表明8个指标之间的偏相关性较强,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为消除指标量纲和指标正负向的影响,本文将上述指标进行正向标准化处理。

本文根据特征值和累计方差贡献率的大小来确定主成分的个数,并依据计算得到的综合得分公式来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按照上述处理方式,计算得出本研究样本省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并将此数据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北京、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较低,青

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西部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是因为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金融资源相对匮乏且较难聚集,信息不对称风险较大,因此,其潜藏的金融风险也较大。

表1 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维度	计算方法	指标性质
不良贷款率	金融(银行)	不良贷款/全部贷款	正向
存贷比	金融(银行)	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	正向
保险密度	金融(保险)	保险费额/当地人口数	负向
股票市场规模	金融(证券)	股票总市值/GDP	正向
企业亏损率	企业	亏损企业亏损额/GDP	正向
资产负债率	企业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适度
财政缺口率	政府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GDP	正向
投资比率	宏观经济	固定资产投资/GDP	负向

表2 2015-2020年样本省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综合评估值

省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361	0.482	0.563	0.440	0.174	0.001
天津	2.109	2.034	2.152	2.308	2.342	2.418
河北	2.561	2.570	2.596	2.403	2.536	2.418
山西	2.382	2.553	2.138	2.150	2.318	1.921
内蒙古	3.016	2.674	2.914	2.810	2.830	2.663
辽宁	2.035	1.621	1.954	2.313	2.466	2.256
吉林	2.466	2.443	2.598	2.444	2.574	2.133
黑龙江	2.524	2.464	2.795	2.493	2.620	2.772
上海	0.643	0.689	0.895	0.851	0.747	0.555
江苏	1.303	1.429	1.542	1.196	0.871	0.704
浙江	2.026	1.961	1.818	1.636	1.486	1.204
安徽	2.656	2.611	2.557	2.365	2.212	2.067
福建	2.518	2.583	2.607	2.356	2.157	2.008
江西	3.132	3.108	3.054	3.077	2.769	2.561
山东	2.092	1.984	2.235	2.276	2.097	1.507
河南	2.406	2.477	2.573	2.419	2.268	1.920
湖北	2.336	2.467	2.408	2.290	2.094	2.017
湖南	2.665	2.691	2.806	2.530	2.400	2.221
广东	1.297	1.278	1.347	0.931	0.681	0.422
广西	3.447	3.114	3.071	2.877	3.159	3.059
海南	2.770	2.548	2.606	2.759	2.589	2.812
重庆	2.294	2.194	2.222	2.156	2.047	2.140
四川	2.380	2.380	2.529	2.299	2.204	2.084
贵州	3.679	3.395	3.513	3.164	2.987	2.781
云南	3.395	3.375	3.324	3.148	2.900	2.644

续表 2

省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陕西	2.402	2.539	2.599	2.281	2.246	1.996
甘肃	3.429	3.398	3.655	3.975	4.878	4.667
青海	4.466	4.192	4.033	4.077	4.300	4.006
宁夏	3.389	3.404	3.160	3.596	3.536	3.296
新疆	2.637	2.551	2.701	2.557	2.566	2.525

2. 政府审计

本文采用审计处理处罚功能(Audit1)和审计增收减支功能(Audit2)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府审计能力。其中,审计处理处罚功能为审计处理处罚数额(处理处罚数额包括应上缴财政收入、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应归还原渠道资金以及应缴纳的其他金额)的自然对数,以衡量政府审计的监督力度。审计增收减支功能为已上缴财政金额与已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之和的自然对数<sup>[25-26]</sup>。

3.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调节变量参照刘俸奇等<sup>[27]</sup>的做法,选取政府绩效、法制建设、监管质量、经济发展、民生保障 5 个一级指标,通过熵值法构建地方政府治

理能力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如表 3 所示。计算得出的 2015—2020 年样本省份政府治理能力综合评估值如表 4 所示。

表 3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指标属性
政府绩效	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支出/各省份总人口	正向指标
	行政效率	1-(行政管理费/财政收入)	正向指标
法制建设	法制环境	中介组织发育得分和法律得分	正向指标
监管质量	公共安全监管	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发生数	负向指标
经济发展	经济产出	GDP/各省份总人口	正向指标
	教育水平	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	正向指标
	研发能力	专利授权数量/各省份总人口	正向指标
民生保障	可支配收入	可支配收入/各省份总人口	正向指标
	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参数/各省份总人口	正向指标

表 4 2015—2020 年样本省份政府治理能力综合评估值

省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621	0.666	0.723	0.804	0.855	0.915
天津	0.444	0.487	0.521	0.587	0.636	0.687
河北	0.077	0.087	0.102	0.123	0.140	0.168
山西	0.102	0.107	0.127	0.146	0.163	0.189
内蒙古	0.168	0.188	0.200	0.225	0.244	0.262
辽宁	0.166	0.168	0.184	0.206	0.224	0.251
吉林	0.142	0.161	0.180	0.197	0.214	0.247
黑龙江	0.142	0.145	0.165	0.186	0.211	0.247
上海	0.503	0.545	0.599	0.666	0.696	0.768
江苏	0.304	0.292	0.312	0.370	0.399	0.503
浙江	0.354	0.348	0.366	0.434	0.462	0.538
安徽	0.117	0.118	0.134	0.164	0.183	0.216
福建	0.201	0.221	0.247	0.296	0.311	0.371
江西	0.103	0.121	0.138	0.174	0.203	0.235
山东	0.136	0.143	0.155	0.177	0.194	0.240
河南	0.070	0.082	0.096	0.119	0.134	0.154
湖北	0.128	0.138	0.158	0.185	0.207	0.242
湖南	0.101	0.111	0.128	0.149	0.171	0.197

续表 4

省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广东	0.244	0.259	0.296	0.346	0.375	0.440
广西	0.069	0.077	0.090	0.107	0.126	0.147
海南	0.223	0.223	0.249	0.291	0.327	0.374
重庆	0.194	0.213	0.223	0.253	0.272	0.302
四川	0.103	0.111	0.129	0.157	0.169	0.193
贵州	0.063	0.062	0.085	0.107	0.130	0.154
云南	0.052	0.062	0.078	0.094	0.110	0.123
陕西	0.143	0.159	0.169	0.197	0.222	0.257
甘肃	0.078	0.093	0.111	0.133	0.147	0.169
青海	0.278	0.307	0.332	0.374	0.414	0.447
宁夏	0.250	0.287	0.316	0.338	0.357	0.388
新疆	0.137	0.149	0.170	0.187	0.195	0.210

#### 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以往研究大多采用城投债务数据来衡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自2015年推行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政策开始,发行政府债券成为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主要渠道,地方政府债券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最主要的来源之一<sup>[28]</sup>。因此,本文参照赵旭霞等<sup>[29]</sup>的研究,采用官方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券与GDP之比来衡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5.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选取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率(*EGR*),通过地区当年GDP与上年

GDP之差占地区上年GDP的比重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以外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Industry*),通过第二产业GDP占GDP总量的比例来衡量;财政分权(*DFE*),通过地方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来表示;房地产投资增速(*House*),通过当年房地产投资额与上年房地产投资额之差占上年房地产投资额的比重来表示;审计单位数(*AU*),取审计单位数的自然对数;市场化指数(*MA*),来自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5所示。

表5 变量定义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系统性金融风险	<i>Risk</i>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的综合指数
解释变量	审计处理处罚功能	<i>Audit1</i>	审计处理处罚数额的自然对数
	审计增收减支功能	<i>Audit2</i>	审计已上缴财政金融+已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的自然对数
中介变量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i>Debt</i>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专项债务)/GDP
调节变量	地方政府治理水平	<i>Gov</i>	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的综合指数
	经济增长率	<i>EGR</i>	(地区当年GDP-地区上年GDP)/地区上年GDP
控制变量	审计单位数	<i>AU</i>	审计单位数的自然对数
	房地产投资增速	<i>House</i>	(当年房地产投资额-上年房地产投资额)/上年房地产投资额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i>FDI</i>	外商投资额/GDP
	市场化指数	<i>MA</i>	来自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
	产业结构	<i>Industry</i>	第二产业GDP/GDP总量
	财政分权	<i>DFE</i>	地方财政支出/中央财政支出

### (三)模型构建

为考察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本文构建基准模型(1):

$$Risk_{it} = \alpha_0 + \alpha_1 Audit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epsilon \quad (1)$$

考虑到地方政府治理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模型(2):

$$Risk_{it} = \gamma'_0 + \gamma'_1 Audit_{it} * Gov_{it} + \gamma'_2 Gov_{it} + \gamma'_3 Audit_{it} + \gamma'_4 Controls_{it} + \epsilon \quad (2)$$

为考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中介作用,本文参照温忠麟等<sup>[30]</sup>的三步法,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模型(3)和模型(4):

$$Debt_{it} = \beta_0 + \beta_1 Audit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epsilon \quad (3)$$

$$Risk_{it} = \gamma_0 + \gamma_1 Audit_{it} + \gamma_2 Debt_{it} + \gamma_3 Controls_{it} + \epsilon \quad (4)$$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Risk_{it}$ 表示省级系统性金融风险, $Audit_{it}$ 表示政府审计功能, $Debt_{it}$ 表示省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Gov_{it}$ 表示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Controls_{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系统性金融风险( $Risk$ )的均值为2.400,中位数为2.465,标准差为0.860,最小值为0.001,最大值为4.878,表明各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差异明显且波动较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关注各地的特殊性,不能实行“一刀切”的政策;样本中审计处理处罚功能( $Audit1$ )的平均数为15.002,中位数为15.179,标准差为0.952,最小值为12.250,最大值为16.740;审计增收节支功能( $Audit2$ )的平均数为12.830,中位数为12.901,标准差为1.193,最小值为8.910,最大值为15.140,表明样本省份政府审计的治理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原因可能是受审计资源

分配不均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变量存在充分的差异,表明本研究具有可行性(注:为防止多重共线性的干扰,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所得 $VIF$ 值均小于5,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6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数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isk$	180	2.400	2.465	0.860	0.001	4.878
$Audit1$	180	15.002	15.179	0.952	12.250	16.740
$Audit2$	180	12.830	12.901	1.193	8.910	15.140
$Debt$	180	0.261	0.230	0.126	0.074	0.816
$Gov$	180	0.441	0.416	0.107	0.304	0.840
$EGR$	180	0.063	0.071	0.066	-0.250	0.299
$House$	180	0.058	0.068	0.111	-0.411	0.292
$AU$	180	8.022	8.171	0.787	6.107	9.484
$FDI$	180	0.017	0.015	0.014	0.000	0.121
$MA$	180	7.232	7.060	2.043	3.130	12.000
$Industry$	180	38.450	39.646	7.240	15.970	51.220
$DFE$	180	0.028	0.024	0.014	0.006	0.074

### (二)回归分析

本文选取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多元回归结果如表7列(1)和列(2)所示。由表7列(1)可知,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充分发挥某一地方政府审计的监督作用,有助于降低该区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该地区的金融稳定。由表7列(2)可知,审计增收减支功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审计增收减支功能发挥得越好,就越能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审计通过上缴财政和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进而起到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假设H1得到验证。

### (三)调节效应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在政府审计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7列(3)和列(4)所示。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审

计去中心化后相乘,得出交互项  $Audit1*Gov$  和  $Audit2*Gov$ 。由表7列(3)可知,审计处理处罚功能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由表7列(4)可知,审计增收减支功能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交互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越强,就越能提升政府审计工作的质量,从而加强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抑制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

表7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i>Risk</i>	(2) <i>Risk</i>	(3) <i>Risk</i>	(4) <i>Risk</i>
<i>Audit1</i>	-0.092*** (-3.35)		-0.082*** (-2.83)	
<i>Audit2</i>		-0.078*** (-2.65)		-0.074** (-2.41)
<i>Audit1*Gov</i>			-0.524*** (-2.86)	
<i>Audit2*Gov</i>				-0.250* (-1.88)
<i>Gov</i>			-0.346 (-0.43)	-0.393 (-0.41)
<i>EGR</i>	0.146 (0.37)	0.012 (0.03)	0.248 (0.64)	0.046 (0.13)
<i>House</i>	-0.008 (-0.05)	-0.082 (-0.51)	0.007 (0.04)	-0.082 (-0.49)
<i>AU</i>	0.099 (1.07)	0.100 (1.10)	0.111 (1.17)	0.125 (1.32)
<i>FDI</i>	-3.152 (-1.52)	-3.360 (-1.60)	-3.259 (-1.54)	-3.333 (-1.59)
<i>MA</i>	-0.315*** (-2.91)	-0.337*** (-3.10)	-0.302*** (-2.86)	-0.316*** (-2.88)
<i>Industry</i>	-0.039* (-1.87)	-0.045** (-2.19)	-0.051** (-2.27)	-0.047** (-2.30)
<i>DFE</i>	-49.308*** (-3.12)	-47.363*** (-3.01)	-51.974*** (-2.36)	-49.106*** (-3.21)
<i>Constant</i>	6.303*** (3.76)	6.305*** (3.59)	6.090*** (3.72)	6.252*** (3.50)
<i>ID</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Observations</i>	180	180	180	180
<i>R<sup>2</sup></i>	0.324	0.324	0.353	0.339
<i>F</i>	9.37	7.4	9.95	7.13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  $t$  统计值。下同。

(四) 中介效应

由表8列(1)和列(3)可知,政府审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政府审计能够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由表8列(2)和列(4)可知,在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后,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6.9%和17.2%。这表明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审计能够通过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达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的。假设H3得到验证。

表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i>Debt</i>	(2) <i>Risk</i>	(3) <i>Debt</i>	(4) <i>Risk</i>
<i>Debt</i>		1.035** (2.28)		1.031** (2.20)
<i>Audit1</i>	-0.015* (-1.80)	-0.076** (-2.54)		
<i>Audit2</i>			-0.013* (-1.73)	-0.065** (-2.09)
<i>EGR</i>	0.095 (1.22)	0.048 (0.12)	0.072 (0.92)	-0.062 (-0.18)
<i>House</i>	0.002 (0.04)	-0.010 (-0.06)	-0.011 (-0.27)	-0.071 (-0.42)
<i>AU</i>	0.029 (1.64)	0.069 (0.71)	0.029 (1.60)	0.070 (0.74)
<i>FDI</i>	-1.087*** (-2.85)	-2.026 (-1.02)	-1.124*** (-2.84)	-2.201 (-1.08)
<i>MA</i>	-0.013 (-0.65)	-0.302*** (-3.03)	-0.016 (-0.84)	-0.320*** (-3.18)
<i>Industry</i>	-0.023** (-2.32)	-0.015 (-0.84)	-0.024** (-2.42)	-0.020 (-1.15)
<i>DFE</i>	-7.069*** (-2.68)	-41.988*** (-2.91)	-6.745** (-2.49)	-40.409*** (-2.81)
<i>Constant</i>	1.009*** (2.83)	5.259*** (3.59)	1.012*** (2.70)	5.261*** (3.37)
<i>ID</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Observations</i>	180	180	180	180
<i>R<sup>2</sup></i>	0.404	0.362	0.405	0.363
<i>F</i>	7.3	9.7	6.8	7.3



**(五) 异质性检验**

本文参考宋渊洋等<sup>[31]</sup>的做法,以当期经济案件结案数占收案数的比例来衡量地区的法制水平。法制水平对政府审计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列(1)和列(3)可知,在高法制水平下,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由表9列(2)和列(4)可知,在低法制水平下,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良好的法制水平能够显著提升政府审计的执行效率,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政府审计工作的开展和政府审计职能的发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表9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Risk 高法制水平	Risk 低法制水平	Risk 高法制水平	Risk 低法制水平
<i>Audit1</i>	-0.094** (-2.03)	-0.085 (-1.43)		
<i>Audit2</i>			-0.141** (-2.49)	0.035 (0.71)
<i>EGR</i>	0.709 (1.01)	-0.611 (-1.51)	0.190 (0.31)	-0.633 (-1.54)
<i>House</i>	0.275 (0.98)	-0.138 (-0.50)	0.082 (0.32)	-0.177 (-0.62)
<i>AU</i>	-0.085 (-0.53)	0.320** (2.34)	-0.061 (-0.44)	0.288** (2.04)
<i>FDI</i>	-5.931 (-1.50)	-2.420 (-0.75)	-8.014** (-2.09)	-1.089 (-0.33)
<i>MA</i>	-0.336* (-1.83)	-0.243** (-2.35)	-0.467** (-2.40)	-0.215* (-2.02)
<i>Industry</i>	-0.053 (-1.48)	-0.013 (-0.44)	-0.063* (-1.91)	-0.013 (-0.43)
<i>DFE</i>	-44.403 (-1.45)	-44.291* (-1.87)	-35.816 (-1.25)	-43.749* (-1.94)
<i>Constant</i>	7.988*** (2.91)	3.436* (1.84)	9.591*** (3.04)	1.811 (1.02)
<i>ID</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Observations</i>	97	83	97	83
<i>R<sup>2</sup></i>	0.366	0.581	0.398	0.562
<i>F</i>	5.546	7.065	5.144	6.790

**(六)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解释变量

为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审计处理处罚金额与查出问题金额(*Audit3*)的比值替代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变量。同时,用单位平均增收减支金额的自然对数(*Audit4*)替换审计增收减支功能变量。回归结果如表10列(1)和列(2)所示,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和审计增收减支功能都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结果通过了本次的稳健性检验。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照刘超等<sup>[32]</sup>的做法,去掉系统性金融风险衡量指标中的宏观经济维度指标(即投资比率指标),再加入金融机构的信贷膨胀率指标(适度指标),并进行主成分分析,构建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Risk2*)。KMO统计检验量为0.613,适合主成分分析法,回归结果如表10列(3)和列(4)所示,政府审计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呈显著负相关,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10 稳健性检验结果1:替换变量**

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4)
	<i>Risk</i>	<i>Risk</i>	<i>Risk2</i>	<i>Risk2</i>
<i>Audit3</i>	-0.586*** (-2.81)			
<i>Audit4</i>		-0.078*** (-2.65)		
<i>Audit1</i>			-0.084* (-1.96)	
<i>Audit2</i>				-0.086** (-2.01)
<i>EGR</i>	0.107 (0.27)	0.012 (0.03)	-0.093 (-0.20)	-0.233 (-0.58)
<i>House</i>	0.062 (0.34)	-0.082 (-0.51)	0.118 (0.46)	0.037 (0.15)
<i>AU</i>	0.091 (0.97)	0.021 (0.23)	0.135 (1.04)	0.142 (1.10)
<i>FDI</i>	-2.320	-3.360	-0.278	-0.623

续表 10

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4)
	<i>Risk</i>	<i>Risk</i>	<i>Risk2</i>	<i>Risk2</i>
	(-1.14)	(-1.60)	(-0.10)	(-0.23)
<i>MA</i>	-0.281***	-0.337***	-0.396***	-0.423***
	(-2.64)	(-3.10)	(-2.82)	(-3.08)
<i>Industry</i>	-0.038*	-0.045**	-0.055	-0.061*
	(-1.93)	(-2.19)	(-1.55)	(-1.73)
<i>DFE</i>	-45.264***	-47.363***	-73.589***	-71.738***
	(-2.95)	(-3.01)	(-3.76)	(-3.69)
<i>Constant</i>	4.681***	8.197***	6.252**	6.467***
	(2.94)	(4.31)	(2.61)	(2.66)
<i>ID</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Observations</i>	180	180	180	180
<i>R</i> <sup>2</sup>	0.329	0.324	0.226	0.233
<i>F</i>	8.8	7.480	4.59	4.6

### 3. 改变样本量

2015年的股灾事件导致“千股跌停”现象频发,整个股票市场充斥着流动性危机和杠杆性危机,很多股票市值迅速蒸发,股票市场投资大幅降低。股灾事件引发的经济社会巨大动荡和损失,增加了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因此,为避免股灾事件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本文在剔除2015年的样本之后,再次进行了基准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由表11可知,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仍然呈现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表 11 稳健性检验结果 2: 改变样本量

变量	(1)	(2)
	<i>Risk</i>	<i>Risk</i>
<i>Audit1</i>	-0.068*	
	(-1.89)	
<i>Audit2</i>		-0.077**
		(-2.35)
<i>EGR</i>	-0.041	-0.168
	(-0.10)	(-0.50)
<i>House</i>	0.088	0.005
	(0.41)	(0.03)
<i>AU</i>	0.017	0.009
	(0.15)	(0.09)

续表 11

变量	(1)	(2)
	<i>Risk</i>	<i>Risk</i>
<i>FDI</i>	-2.876	-3.357
	(-0.74)	(-0.85)
<i>MA</i>	-0.367**	-0.406***
	(-2.60)	(-2.88)
<i>Industry</i>	-0.034	-0.038
	(-1.26)	(-1.50)
<i>DFE</i>	-48.004***	-47.584***
	(-2.79)	(-2.78)
<i>Constant</i>	6.868***	7.471***
	(3.67)	(3.68)
<i>ID</i>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i>Observations</i>	150	150
<i>R</i> <sup>2</sup>	0.306	0.324
<i>F</i>	8.7	7.43

##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15—2020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影响以及影响作用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和增收减支功能的有效发挥,能够显著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第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越强,越能提升政府审计工作的质量,从而加强政府审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抑制作用。第三,政府审计能够通过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来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大政府审计力度。政府审计不仅应关注金融领域,揭露金融违法犯罪活动、违规经营、重大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还应加强对地方财政等相关部门的审计,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二是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为政府审计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政府审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三是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监督,规范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行为、土地出让行为以及违

规举债行为,促进政府相关部门公开债务信息,提高政府债务透明度。在抑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同时,避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转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参考文献]

- [1] 张小文. 国家审计在金融风险管控中的功能定位与实现机制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5):56-59.
- [2] 郭晨. 银行系统性风险成因与测度:综述与展望[J]. 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3(3):25-35.
- [3] 张筱,张哲,王乾坤. 金融审计监督功能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基于国家审计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效能的视角[J]. 财会通讯, 2022(1):119-121, 127.
- [4] 许奕,张宝贤. 国家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视角[J]. 财会通讯, 2022(11):134-138.
- [5] Martin F M. Debt, inflation and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5, 79:129-150.
- [6] 李双建,田国强.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模拟与经验证据[J]. 社会科学文摘, 2022(11):94-96.
- [7] 宋夏云,马逸流,沈振宇. 国家审计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中的功能认知分析[J]. 审计研究, 2016(1):45-52.
- [8] Acharya V, Drechsler I, Schnabl P. A pyrrhic victory? bank bailouts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4, 69(06):2689-2739.
- [9] Leonello A. Government guarantees and the two-way feedback between banking and sovereign debt cris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8, 130(03):592-619.
- [10] 张欣. 审计视角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研究[J]. 新金融, 2012(6):45-48.
- [11] 董维明,冯根福. 国家审计在防范区域金融风险中的作用研究[J]. 审计研究, 2015(6):13-18.
- [12] 叶陈云,叶陈刚,李享. 国家审计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核心功能、约束因素与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双向战略协同视角的理论分析[J]. 财会通讯, 2023(11):13-19, 109.
- [13] 叶陈云,叶陈毅,徐澜语,等. 国家审计化解金融风险特征、形势及缺失治理[J]. 会计之友, 2022(15):126-132.
- [14] 于佳怡,李作家. 宏观审慎政策下国家审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路径分析[J]. 商业经济, 2020(5):181-183.
- [15] 于佳怡. 国家审计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中的应用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21(26):116-121.
- [16] 毛锐,刘楠楠,刘蓉.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触发机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19-38.
- [17] 刘凯. 基层政府治理转型视域下的审计治理功能与路径[J]. 现代审计与会计, 2021(11):9-10, 13.
- [18] 亢鸽.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思辨[J]. 新会计, 2021(6):38-40.
- [19] 郭全芝. 基于哲学视角谈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的关系[J]. 决策探索(下), 2020(11):83-84.
- [20] 陈宝东,邓晓兰. 货币政策被地方政府债务绑架了吗?[J]. 经济管理, 2019(10):5-21.
- [21] 李凯风,李星. 债务风险水平的识别及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基于熵权TOPSIS法和综合模糊评价法[J]. 上海金融, 2019(3):74-80.
- [22] 仲杨梅,张龙平. 国家审计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了吗?[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9(3):1-10.
- [23] 沈丽,刘媛,李文君. 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空间关联网络及区域传染效应:2009-2016[J]. 管理评论, 2019(8):35-48.
- [24] 张曾莲,岳菲菲. 国家审计维护金融稳定的路径与机制研究[J]. 金融经济研究, 2021(2):34-51.
- [25] 马东山,韩亮亮,张胜强. 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吗?:财政分权的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4):9-21.
- [26] 陈宝东,王颖鹏. 政府审计、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J]. 统计与决策, 2022(10):126-131.
- [27] 刘俸奇,储德银,姜春娜. 财政透明、公共支出结构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J]. 经济学动态, 2021(4):107-123.
- [28] 韦小泉. 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风险的影响研究[J]. 审计研究, 2020(4):51-57.
- [29] 赵旭霞,田国强. 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同业业务: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23(1):159-176.
- [30]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614-620.
- [31] 宋渊洋,刘颀. 中国各地区制度环境测量的最新进展与研究展望[J]. 管理评论, 2015(2):3-12.
- [32] 刘超,孙晓鹏. 金融结构对金融风险影响的空间外溢性与区域异质性研究[J]. 统计研究, 2023(4):73-87.